

经济文摘

Digest

外国国库存些什么



美国财政部大楼

人们常说的国库,通常是指国家金库,是一个存放具体实物、货币和黄金的库房。但现代意义上的国库,已经不单单是国家金库,每个国家的国库往往都担负着保管、管理该国财政的资产和负债,以及反映该国预算执行情况的一系列国家财政职能。国库的职能已由传统的“库藏”管理发展成控制政府预算内、外资金,管理政府现金和债务等全面财政管理。

各国国库存什么

国库分为财政国库和财产国库两大类。像俄罗斯,所有的财政国库资金收支都是通过财政部在俄中央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中设立的国库账户进行的。财产国库则是所有国有资产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国库所存放的不仅仅是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固定资产。但因为国有土地、政府办公大楼、军舰、飞机等不需要收藏,所以国库里真正需要收藏保管的还是体积小、价值大的黄金、美元和各种债券等。

政府没收的许多私人物品,入了国库后,政府会把它们拍卖,因为政府不保管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而是把它们变成货币入库。比如,美国纽约一年就有几次专门拍卖海关没收的东西。

瑞士至今仍保持着全世界唯一的金本位制,其国库里堆满了黄金是众所周知的事。据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世界各国国库的黄金总储量为32946吨,其中储量超过1000吨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是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瑞士国库目前有黄金储备2590吨,约占世界各国国库黄金总储量的7.7%。按人均算,瑞士是全球人均拥有黄金量最多的

国家。瑞士联合银行贵金属部首席分析师里德向记者表示,瑞士国库中除了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和美元资产外,也存有一定数量的欧元、英镑等主要硬通货和外国政府的债券;此外,瑞士国库不仅管理着巨额的不动产,而且凭着力求盘活富裕资金的原则,还在千方百计地进行着各种金融投资。

在日本国库中,储存的主要是外汇、外国债券、黄金等贵金属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和世界银行的票据等。据日本财务省1月11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12月底,日本国库中的外汇储备相当于8445.43亿美元。其中,外国债券折合美元为6993.98亿;外国货币现金1248.66亿美元,有的存在外国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有的存放在日本国内的金融机构,还有的存在外国金融机构设在日本的分支机构

构;此外,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以及世界银行的票据,一共95.03亿美元。另外还有相当于107.76亿美元的黄金储备。

俄罗斯国库中既存着货币黄金,也有外汇等其他储备,还有一部分黄金、外汇储备存在国外。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为了避免石油收益的美元存放在美国被美国政府冻结的危险,将大量外汇收入存到欧洲,形成了脱离美国政府控制的大量“离岸美元”。

国库财宝怎么存

瑞士国库里的黄金,部分存放在伯尔尼瑞士联邦政府大楼和联邦议会大厦前面的广场地下深处。它处在地下百米处的防核弹掩体内。除了这座从未对外开放的地下金库外,瑞士还有不少储备黄金的国库是对公众

开放的,目的在于炫耀储备之安全,吸引更多的国外托管客户。

瑞士国库的安全程度可称得上世界之最。国库的每个过道和入口处都设有先进的红外线电子检测系统,任何异样的动静和异物都无法逃脱它们的监控。每进一道门都得由分别掌管三把不同钥匙的三个人同时将钥匙伸进锁槽,并经过对持钥匙人身份证、指纹、眼球的红外扫描检测合格后,再输入由数字和字母混合组成的一连串密码,只有上述程序正确无误,厚重的国库第一道门才能开启。然后是只能容纳单人进出的狭小的电子遥控旋转门,若身上带有稍大的物件根本无法进出。对所有参观者和工作人员都实行全天候摄录监控,并拍摄成带子备查。

日本的现金以及黄金储备大部分都存放在日本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中。但在部分黄金交易中,只是账面上的来往。

众所周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具有黄金储备功能,英国伦敦塔专门收藏珠宝首饰,俄罗斯的国家金库则是两种功能兼具。据俄媒体透露,俄有一个专门的国家金库。它坐落在一幢不起眼的灰色楼房中,电梯陈旧,但每个房间都配备了厚厚的钢制大门,一排排编码的保险箱中存放着各种具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珍宝。据报道,有黄金、宝石、首饰、钱币和各类贵金属。金库内一块黄金就重达10多公斤。截至2004年11月1日,俄央行持有的黄金价值约37亿美元。此外,金库中珠宝的比重也很大,目前所藏的各类宝石大约有9000种。存放的各类琥珀,都是极品。据介绍,为了严格保持特定的温度和湿度,金库为这些宝石的存放费尽心机,还安排了大批工作人员每天根据宝石的形状、大小、颜色和质地将其分门别类,仔细包装。这里的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娘子军。

美国储藏本国黄金有两个地方,一个在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一个在纽约州的西点。两地都是军事基地,都是地下金库。记者曾想到诺克斯堡的金库看看,结果偌大的军事基地,许多地方可以随便开车进入,惟独金库用铁丝网拦住,外人不得入内。至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金库,主要是存放外国的黄金。

存在国库里的家底怎么花

根据瑞士国库管理法,存入国库的黄金不能轻易动用,若要减持国库黄金存量,则必须经全民公决,征得多数公民同意后政府方可动用。瑞士社民党发动议员向联邦政府多次施压,要求政府将过剩的黄金抛售,用所得款项进一步改善养老福利,然而,瑞士国库一次次地顶住了压力,不让动用。

俄罗斯的金库是有进有出。2002年8月,俄财长阿列克谢·库德林曾表示,为了偿还外债,俄罗斯打算把存在国库中的珠宝拿出一部分出售换成现金。俄国库的东西进出规定是非常严格的:首先,出售或者转让方式通常是举行拍卖。其次,必须得到总统的批准,拿到总统令才可以开始拍卖。第三,近年来国库的拍卖品主要是“俄国国家珍宝储备”中超过10.8克拉的巨大钻石。第四,拍卖形式独特。拍卖品在拍卖会上不展示,竞拍者只能提前一个月去看一眼,拍卖会上各方在特制的信封上写上姓名并在信封内标明报价,谁的报价高谁最后胜出。

从2002年开始,俄联邦财政开始进入稳定的盈余期,原来为应对石油降价而建立的稳定基金累计已有近150亿美元。俄罗斯目前正考虑动用国库钱财提前偿还外债。

(文/何洪涛 赵剑英 常喆 张莉霞 摘自《环球时报》)

经济生活

在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中,不少用人单位将录用者的最高年龄定在35岁,很多35岁以上的求职者因此失去求职机会

35岁,咋就成了一道坎儿

“上有老,下有小,找工作嫌你老,想退休嫌你小。”如今,“35岁”对很多求职者来说成为一个非常尴尬的年龄。为什么不是30岁或40岁,用人单位偏偏将招聘的年龄卡在35岁这个坎儿上?当记者在人才市场向招聘者询问时,许多人的答案竟是“约定俗成”、“依照惯例”!

实际上,将“35岁”作为一个用人的界限,是我国长期形成的“招聘文化”的一个缩影。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兴用人年轻化之风,当时将基层年轻干部的划分界定在35岁以下。从那以后,人们普遍接受了用35岁来衡量人才年轻与否的思维定势。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寿命不断延长,对职业生涯的结构规划已经有了调整和改变,但不少用人单位仍沿袭了以往的惯例,依然会下意识地将用人的年龄要求与35岁挂钩。

资料显示,国际上公认的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是35至45岁。根据通行“国际标准”,大多数国家都把“青年”的年限界定为不超过45岁。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彭剑锋认为,把“35岁”作为一道坎儿,没有科学依据。

“35岁现象”的利益驱动

为什么许多用人单位更倾向于接纳35岁以下的员工?专家分析,35岁以下年龄段具备的特点造成了他们在竞聘中的优势。一方面,35岁以下的员工可塑性强,易培训开发,没有太多的积淀陋习;另一方面,他们适应性强,能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他们学习能力强,更容易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新思维。此外,35岁以下求职者相对来说流动意愿强,容易招聘,使用成本也比35岁以上低许多。

“35岁现象”称得上是中国特色,由于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供过于求,才会导致招聘方占据主动权,可以对求职者提出苛刻的年龄要求。”彭剑锋说。根据国务院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目前在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中,35岁以下的占70%左右。粥少僧多,庞大的求职队伍在招聘方前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容忽视的是,在人才市场上提出35岁以下要求的,一般招聘的是中基层管理者以下的岗位,这些岗位本就以35

岁以下者居多,大部分知识技术含量并不高,年轻就容易成为优势。而高层岗位往往都是通过猎头组织获取的,这样的高层次人才在流动时是不会受年龄的限制的。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职业化人才短缺,人才的选择、知识积累不够职业,使得用人单位在经验年限和资历,而非能力和业绩来评价人才的思维定势。事实上,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光凭年龄武断地划划分是肯定行不通的。古有“太公八十遇文王,甘罗十二为丞相”,年龄与评价一个人是否是人才无关,这个道理古人尚且明白,今天我们再用“35岁”的硬杠杠教条地选拔人才,岂不令人汗颜?杜绝“35岁现象”,需要将“能者即为人才”的观念深入每一个人的头脑,尤其是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人们。

(文/姜洁 摘自《人民日报》)

财富人物

解读厉以宁

这个鸡年春节,厉以宁的忙碌没有丝毫减少。“厉教授已经75岁高龄了,但他每天忙得像个快乐的陀螺。”他的一个学生很是感慨地告诉记者。

有着多重身份的厉以宁最愿意面对公众的,就是以经济学者的身份公开或半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活跃异常。对于他的活跃,他的影响力,坊间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断在臆测着其观点发表的原因,争论不休。厉以宁,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经济学家。

“厉股份”

“厉股份”是厉以宁在上世纪90年代被冠以一个非常有特征的别号,由于当时他积极倡导股份制。对此,厉以宁看得很透彻也很谦虚:“股份制在中国得以推行有赖于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那是在1980年夏季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和我一样,冯兰瑞、赵履宽、胡志仁、鲍恩荣,他们都建议要进行股份制试点。80年代初,于光远、童大林、蒋一苇、王珏等也曾多次发表类似的观点。怎能说我是股份制在中国的首倡者呢?”

厉以宁也表示,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最好的阶段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更好。主要是这个时期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和主张被认同了。厉以宁说:“一个经济学家,当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被决策机关采纳而变成国家政策的时候,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权威学者之一,这些年来厉以宁在参与决策、影响决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对股份制的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从机制制度上防止和杜绝用人上的歧视。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对于如何界定就业歧视,目前我国还没有更加详细的法规,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就业歧视法》应值得我国借鉴。

“厉暴富”

机制、制度诚然是防止“35岁现象”的有效手段,但要从根本上消除就业歧视,还要打破陈旧的用人观念。用人单位认为35岁以上员工使用成本高、难管理,主要是因为不少管理者习惯了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论资排辈的人才使用观念,长期以来形成了更愿意用年龄和资历,而非能力和业绩来评价人才的思维定势。事实上,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光凭年龄武断地划划分是肯定行不通的。古有“太公八十遇文王,甘罗十二为丞相”,年龄与评价一个人是否是人才无关,这个道理古人尚且明白,今天我们再用“35岁”的硬杠杠教条地选拔人才,岂不令人汗颜?杜绝“35岁现象”,需要将“能者即为人才”的观念深入每一个人的头脑,尤其是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人们。

2003年8月2日,韩德强又撰写了《从“厉股份”到“厉暴富”》的文章,不但对厉以宁做出全面的批评,更以“厉暴富”来形容厉以宁。也是在2001年左右,一则厉以宁家族通过上市策划、咨询、上市推荐等业务案附近亿的报道,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刊出,并在网上广泛流传。据悉,后来厉家在港状告《争鸣》,并从《争鸣》获赔偿15万元人民币。

时隔3年,2004年3月,上海《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刊登了名为《“厉以宁家族暴富”风波》的文章,再次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厉以宁家族暴富风波”的由来和经过”,说“厉以宁之子厉伟等人以各种名义在其他公司中出资和在外地购置房产、汽车,以及在境内外存款若干。据估计,该暴富家族总资产已经超过1亿元。”

其后在2004年4月15日,《瞭望东方周刊》为该文刊登了《致歉声明》,表示“此文未采访厉以宁先生及其家属,又没有对涉及他们的重要内容进行核实……对于上述因素给厉以宁先生及其家属带来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

厉同学

1930年11月22日,厉以宁出生于南京。四岁时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上海学习。1941年,厉以宁考上竞争激烈的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从小学到中学,我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我还爱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谈起兴趣,厉以宁总显得兴致勃勃。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这里,厉以宁的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

1949年2月,厉以宁以优等生资格接到了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录取通知书。当年12月,厉以宁到湖南沅陵参加工作,在一个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

1951年,已参加工作两年的厉以宁又参加了高考。为方便起见,他就委托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从我做过会计的工作经历等几个方面考虑,赵辉杰认为我选经济系最合适,就替我做主,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至今,厉以宁都觉得赵辉杰代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教授

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希望从事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我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所以不愿讲课,就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这个活儿一干就是20年。”厉以宁很认真地表示,这20年的积累使他获益不少。上个世纪70年代末,厉以宁才开始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中。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三年级的张彤彤告诉记者:“厉以宁是最受好评的教授之一。作为我们院的院长,他不仅经济学理论让我们崇拜,而且风度也让我们钦佩不已。”

“他讲课的时候,你不会觉察到他的年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讲起厉以宁授课的情景,张彤彤颇为兴奋,“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



漫画/孙晓纲

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一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课程后会问:‘你们看有没有道理?’听厉教授的课就像是与他边炉边交谈,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课总是堂堂爆满,有时连走廊里也坐满了人。”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这是厉以宁对自己的一贯看法。他曾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且把“教书”当作一个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因此,尽管他的写作活动繁忙,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多,他始终还是把讲课放在了第一位。

厉诗人

“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是厉以宁40多年前填的《十六字令》,被人称为是世界上最短的情书。

曾有评价说厉以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说他的诗风清新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繁复的典故堆砌。而厉以宁则回答说:“我从不奉命而作,所有的都是有感而发。”

“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是厉以宁在1955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前夕写过的一首七绝自勉诗。到了1985年,在毕业30周年之际,厉以宁根据自己在北大的经验与体验,把这首七绝扩展为《鹤鸣天》:“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自自由。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2000年11月,适逢厉以宁70大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为他举行了题为“经济学家的诗情画意”的“厉以宁诗词研讨会”。当天,厉教授即兴朗诵了他的一首《破阵子·七十感怀》。“往日悲歌非梦,平生执着追寻。纵说琼楼难有路,盼到来年又胜今,好诗莫自吟。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厉教授念完之后,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对于自己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厉以宁称除了喜欢,还因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做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

(文/陈璐 摘自《周末报》)

热点评议

春运缘何成了富翁的生产线

一场春运下来,一些倒票的“黄牛”竟可以赚下百万身价,这样的奇迹让人觉得春运简直就是一条打造百万富翁的生产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本是普通运输的春运具有了点石成金的魔力呢?仔细分析黄牛们的获利过程就可以发现:当车票成了稀缺的资源时,它就具备了权力寻租的资本,具有了牟取暴利的资格。

笔者认为,车票成为稀缺资源的原因有两个:制度的缺陷和人为的操纵。先看分配制度的缺陷。为优先满足和保证当地机关与客户需要,各个火车站都预先给他们留下了充裕的备用车票,这就意味着游离于“特殊关照群体”以外的购票者被不公平地对待。而内在的计划票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车票的紧缺现象,并为车票寻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从人为操纵看,售票者与倒票者的内外勾结使车票的流通不再顺畅。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只有炒票的人才能把握准时机:放号时,窗口挤的基本上都是倒票的人,旅客根本就接不上;不放号时,旅客就是排上几天几夜,也未必管用。本应直接流通的车票被黄牛们加上了一个自由控制的“龙头”,形成了一个额外的流通渠道,在这个多余的渠道中他们凭借其垄断的地位轻易获得了超额的垄断利润。

因此,今后有关部门应该加大打击的力度,并有针对性地填补制度的漏洞,用严谨的制度和严厉的处罚打破不法者借春运发横财的美梦。(文/李劲强 摘自《大众日报》)

“冷了春节”的冷思考

鸡年春节很冷,北方雪花飞舞,南方冷雨绵绵。与之相对应的是,春节的气氛也比较冷。于是有人感叹中国年味越来越淡了,有人感叹现今“热了圣诞,冷了春节”。不过,要说春节各地都“冷”也不全然,譬如在国外,中国的春节就火了一把。英、法、美等许多西方国家都举办了中国春节庆祝活动,联合国还在纽约总部举行了迎接中国鸡年的晚会。于是,又有人感慨:春节不再只是中国人的节日。

圣诞节是洋节,而今在中国大行其道;春节是咱中国的传统节日,如今也漂洋过海,越来越火。文化交流也好,文化渗透也罢,这算是中西文化打了个平手。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正在蔓延。中国人过洋节,洋人过中国节,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无可厚非。我们不必动辄将文化习俗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不必哀叹春节“节将不节”了。

2月14日,“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个会议上,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如此总结道:“节日是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再现;节日是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节日是社会群体和团团结的黏合剂;节日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节日是提升美好情操和培育丰富情感的熔炉;节日是广大民众展示美好心灵和表现艺术才华的舞台。”节日之美,正如斯言。而春节之美,更自不待言。

(文/左宗伟 摘自《解放日报》)

国企老总高薪合理吗?

据《羊城晚报》1月29日报道,广东省国资委一位官员日前透露:最新的省属国企薪酬设计方案中,约15%的国企老总可拿到100万-150万元的年薪;约4%的老总只能拿到15万-25万元的年薪,约为全省职工平均收入的3倍;处于中等水平的老总年薪为40万-90万元。此前,省属国企老总的年收入只有20万-30万元。

国企老总这样大幅度的薪酬调整,应当由谁来决定,国资委一说了就算吗?要不要财政、税务、劳动人事乃至批准财政预算的人大参与?省总工会与国企的广大员工在这件事上有没有知情权和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或曰:不这样就留不住人才。问题是:第一,现在国企的那些老总都是企业家吗?是市场竞争中冒头头的,还是任命的,可以调来调去乃至与党政机关“通用”的“领导干部”?第二,现在许多国企的是行政垄断或资源垄断,其赢利有多少是凭管理者的能力?尤其关键的是:赢利了拿高薪,亏了怎么办?经常听说民营企业老板因经营不善而自杀,而国企中航母的那个陈久霖,公司赚钱时年薪高达2000多万元;赔了5.45亿美元,还面不改色地赋诗“纵有千万罪,我心坦然对。”亏了,有国家兜着,他当然“坦然对”!

或曰,你看人家美国,“老总”的年薪才叫高呢,那你怎么不比东邻日本呢?日本的企业凝聚力大,职工归属感强,可它们的“老总”年薪一般只有工人的3-4倍,极少有达到5-6倍的。

或曰,高薪可以养廉。可是媒体曾报道过广州百货行业的一个贪污犯,职务消费不计,他的年薪是70万元;可他照贪不误。当下国企做官,行政级别实际上还是存在,而发财却安全得多。如果这种薪酬方案能通过,升官发财二者兼得且心安理得的好事,就要成为某些幸运儿的现实了!

(文/廖烈山 摘自《南方都市报》)

稿费事宜请作者联系
Tel:010-63077367
Email:wlb@zqb.com.cn